



新四军如何搞好廉政建设

□ 陈银健

1937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留在南方八省进行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新四军边组建边开赴抗战前线，屡建奇功，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创建了光辉的业绩。新四军的革命历史，不仅是一部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也是一部廉政建设的革命史。

高度重视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在廉政建设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和作用，新四军在严肃军纪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制度建设。新四军是由南方游击队组建而成，由于长期分散游击作战，养成了许多游击习气。为严肃军纪军规、惩治和防范贪污腐败，新四军组建不久就开始建立规章，严明军纪。1938年6月，新四军军部在行军途中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颁布实施了《新四军十条军规》；1940年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分委发布《部队整训要领》；为惩治和防范贪污浪费，新四军颁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严厉惩处贪污腐败行为；为规范公务人员权力运行，新四军确定了“公务人员的行为准则和奖惩标准”。

1943年12月，新四军政治部又制定了关于拥政爱民的方针，公布了《新四军拥政爱民十大公约》。新四军制定《新四军经济制度》，明确规定在经济制度中统一收支，实行预算决算；做到一切经济归公，反对隐瞒不报；要爱护公物，反对贪污腐败及浪费；执行私人财物登记和按期检查制度；不准贪污浪费公家一文，贪污浪费不爱惜公物者，应受处罚，情节严重者处死。在《新四军财经人员十项守则》中明确规定，要遵守并严格执行各种财务制度；决不自私自违反规定手续，私相通融；不准私自经营商业，不得接受商人任何礼物；不贪污，不腐化，不得将公物赠给私人；不私自挪用公款或私自将公款借给别人。正是由于严格制度和严肃纪律等各项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新四军内部从根本上减少了贪污腐败现象，养成和保持了廉洁的良好作风。

将领带头率先垂范

领导干部的导向作用，对于推动新四军廉政建设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四军要求普通战士做到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首先做

到。副军长项英要求：“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工作中都要作模范，做到在新四军内部最能团结友爱，最能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全面抗战中，新四军伤亡将士8万余人，其中50%为共产党员，团以上干部就有350多位。

三师师长黄克诚计划配发的火柴用完了，就到百姓家锅塘里借火，堂堂新四军师长，坚决不肯动用权力多要一盒火柴。一师师长粟裕严于律己，严格要求后勤部门按供给标准办事，决不允许为他准备超标准伙食。他一再申明：“不得搞什么实报实销之类。”他留客吃饭的费用，都从他当月津贴费中扣除。1940年2月，身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的陈毅与张茜用两个喜字、一碗面、稻草铺床结了婚。谭震林师长以身作则，与机关同志同吃一锅饭、同吃一样菜，不搞特殊。新四军第六师供给部部长李建模兼任江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处处长，掌握着数量不小的经费，但他严于律己，生活简朴，每餐饭菜都和同志们一起吃，有时甚至吃无油的菜汤。这样的廉洁典型在新四军领导干部中数不胜数，他们廉洁自律，严格执行新四军各项纪律制度，与广大指战员同甘共苦，与人民群众同舟共济，以自身过硬的素质和行为带动和促进了新四军廉洁风气的普及。

反对腐败决不姑息

新四军从上到下执行铁的纪律、廉洁为民，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无论到哪里，部队都能很快站稳脚跟。1941年在盐城第二次参政会上，刘少奇郑重承诺：个别贪污分子，我们已经查办！以后还要查办的，这是我可向各位保证的，请各位信任我们！1941年春，代军长陈毅听到东台县开明绅士施文舫批评新四军有欺压百姓为非作歹行为。陈毅非常重视，要求立即查明。经查，区委干部谭启民贪污腐化，欺压百姓。查明事实后，立即将其撤职查办。事后，陈毅又亲自赶到40里外的地方去见施文舫先生，当面道歉并说明对当事人的处理意见。

新四军和各根据地政府严厉惩处腐败分子的行动，不仅使党的威信得到了增强和提高，而且深刻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挽救了一大批犯错误的人民。1943年5月，新四军五师三十八团一个连

长贪污6元钱，这么小的一件事，在李先念手下却行不通，最终被绳之以法。该团政委周庆鸣对全团官兵说：“6元钱，数字并不惊人，但大家要记住，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有信心打败日本强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铁的纪律、血的纪律。”1942年曾任新四军苏中军区交通站长的陈新，因私卖公家一条棉裤而获300元，新四军军直党委决定开除其党籍。1942年秋天的两个月内，仅苏中三分区就有4名干部因贪污被判刑。

注重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

新四军积极创办报纸、刊物，建立政治思想教育阵地，以此为载体深入开展廉政教育和廉政宣传。从1938年4月进驻安徽后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创办的报刊主要有：《抗敌报》、《抗敌》杂志、《抗敌画报》、《拂晓报》、《战士报》、《火线报》等。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抗敌报》恢复出刊，并创办了《敌国汇报》《军事建设》等刊物。新四军新改编的7个师及所属各旅都办有报纸。新四军利用所创办的报刊对广大指战员进行理想信念、道德情操、革命精神、优良作风教育以及纪律教育，刊登领导讲话、文章，供干部战士学习，并对有关廉政事件进行报道，表扬先进、鞭策后进，积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新四军还积极利用多种文艺形式进行廉政宣传和廉政教育。新四军初建时，成立了战地服务团、为进步的文化工作为部队服务、为抗日服务。重建军部后，刘少奇和陈毅也非常重视文化工作，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苏北文化协会以及鲁艺实验剧团、抗大文工团、军师鲁工团、八旅文工队等文艺团体。各文艺团体运用话剧、演唱、墙头诗、木刻以及淮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在新四军与各根据地内既从事抗日宣传，又创作出一批具有廉政文化教育意义的作品。新四军高度重视廉政建设，凝聚了军心，赢得了民心。民谣《白菜心》中唱道：“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打仗总是打胜仗，从来不败老百姓，老百姓，老百姓，人人要当新四军！”



陈再道上将是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由战士成长为我军优秀将领的。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被毛泽东称为“一员战将”，被陈毅元帅盛赞“再道之勇”。他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热爱人民，关心人民，关注人民疾苦，甘当人民公仆，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共建鱼水情

陈再道说过：“和老百姓在一起，就不存在垮台问题。就是坐牢杀头，讨米要饭，老百姓也不会忘记你！”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38年1月，陈再道奉一二九师首长指示，率领东进纵队创建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在开展斗争的过程中，不论走到哪里，他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军队纪律。由于他把搞好军民关系看得重于一切、高于一切，因而深得冀南人民的拥戴和尊敬。1941年始，由于连续两年干旱少雨，庄稼颗粒无收，加上日伪军的烧杀抢掠，冀南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最为艰难时期。为了帮助人民群众战胜灾荒，陈再道带头将部队的口粮从每人每天一斤二两小米减为一斤，并每天再省出二两来救济灾民。1942年，陈再道带领部队在馆陶地区遇到一拨逃难群众，望着背井离乡的逃荒灾民，他立即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的米袋子解开，把里面的小米全部给了逃难群众。战士们一见，也纷纷解开了自己的米袋，把大伙凑起来的为数不多的小米送给了灾民，百姓深受感动。正是靠着这种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陈再道带领的部队与冀南人民在艰苦复杂的抗日战争中结下了极其深厚的革命情谊。

新中国成立后，陈再道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群众的来信来访。为此，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做了四条规定：一是群众来信，封封必回；二是群众求助，尽力而为；三是不该办和不能办的，也要讲清道理，说明原因；四是无论如何，不能怠慢老百姓。

1982年，为解决天津人民吃水难的问题，天津市决定将滦河水引入天津。陈再道时任铁道兵司令员，他对这项缓解天津水源不足的重大民生工程十分重视，从确定施工队伍、工程设计与组织指挥，都作了明确要求，强调承担此项施工任务的部队，要发扬铁道兵部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传统，优质、高产、按期完成任务。在正式施工期间，他多次过问施工情况，亲自到施工现场检查指导工作，给部队指战员以极大关心和鼓舞。在天津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铁道兵部队圆满完成了任务，谱写下军民鱼水关系的新篇章。

关爱孩子情

无论是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陈再道始终关心关爱祖国下一代的成长，希望他们成为真正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1943年夏，陈再道带领冀南军区部队在清河县许二庄一带驻扎。一天清晨，该村抗日小学老师带领学生沿村路正在跑操，正巧碰到陈再道带领部队操练归来，当两支队伍还有十多米就要相遇的时候，陈再道命令战士们停下来，然后自己朝路边一闪，站在泥水中，瞬间，战士们也一字排开，全部站进了路旁的泥水中。抗日小学带队老师只好带领学生们用最快的速度跑了过去。当战士们从脚膝深的泥水中走出来后，陈再道望着远去的学生队伍深情地说：“我们今天浴血抗日，不就是为了人民群众，为了这些孩子们吗？孩子们是国家的未来，所以，我们应该时时处处关心爱护这些孩子们。”

1987年，陈再道回到家乡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乡新村，看到村里的孩子们在低矮、破旧、昏暗的教室里上课，心里十分难过。他对陪同的当地干部说：“孩子们的教育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的大问题，一定要创造良好的环境，让孩子们在学校里安心学习，培养于祖国、于人民有益的一代新人。”他立刻与村干部一起选定学校新址，扶持新村建了一所宽敞明亮的小学。1988年，乘马岗乡党委、乡政府准备把全乡危房过半的唯一一所学校拆除后新建一座教育大楼，但因老区经济落后，资金问题难以筹措。陈再道得知这一情况后，首先肯定了家乡干部的想法，然后又谈了些个人看法，并亲自与有关部门联系给予扶持。在大楼的修建过程中，他多次来信询问建设情况，反复叮嘱要保质保量。大楼顺利落成后，他又亲自为该校题写校名。值得一提的是，陈再道在退出领导岗位后，多次参加教育部门、学校、幼儿园组织的活动，与许多小学生长期保持通信，赠送回忆录给他们，并写信鼓励他们继承革命传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心怀老区情

陈再道对革命老区，始终怀着一颗忠诚挚爱的赤子之心。无论在职期间还是退出领导岗位后，他无时无刻不挂念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无时无刻不关心革命老区人民的疾苦。

“文革”后期，大旱无雨，陈再道带病回到了家乡。当他目睹田地里枯萎的农作物时眉头紧锁，马上与乡里的同志商量，安排群众寻找水源，添置抽水机械，进行抗旱保苗。在他的指导下，农作物的损失降到最低点。同年秋季，陈再道又亲自写信指出：“要做好防旱排涝工作，必须兴修水利，积水备旱，挖渠排涝，只有把水利利用好了，才能旱涝保收。”在他的关怀下，乘马地区先后修建大小水库三十多个，开挖渠道三十余条，计二百余里，基本做到了旱涝保收。

陈再道上将的人民情怀

□ 严国红

1987年10月，陈再道到湖南湘西革命老区桑植县视察。他提出要到贫困山村看望农民群众。当天大雨滂沱，78岁高龄的陈再道踏上了不通汽车的崎岖山路，顶风冒雨，一步一滑地走到村里。当他来到一户农民的屋里，望着漏雨的屋顶，望着乡亲们那补丁补补丁的衣服，眉头紧锁，面孔冷峻，一言不发。临走时，他一再向乡亲们作揖告别。从该村回来后，陈再道一连好几天都是默默独坐。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动情地说道：“老区人民为革命胜利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建国快四十年了，他们还这么苦，我们这些老家伙怎么好意思去见马克思？”

1993年元月，陈再道家乡村村来人看他，他在病床上像往常一样热情接待家乡来客。他询问家乡生产和建设情况，问农民的吃饭问题解决了没有，经济上有没有困难，孩子们能不能正常上学，等等，言语中对农民充满着关心和厚爱。当听说农民吃饭、穿衣和子女上学都没有困难，只是各种名目繁多的集资过多，农民经济负担过重时，他陷入了沉思。片刻之后，他沉重地说：“这种做法不对，长期下去会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个问题要解决，要向上面反映。”春节前夕，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到医院看他。陈再道当面反映了农民经济负担过重的问题，得到了中央领导的答复。始终不忘自己是人民的儿子，始终不忘肩负着人民的深切期望，这是陈再道传奇人生的真实写照。

军事民主的生动实践：火线诸葛亮会

□ 汤春松

在战场上，敌情是瞬息万变的，认识掌握敌情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何在战场上及时分析研判已经变化的敌情，研究出切实有效的制胜战法，这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火线诸葛亮会，就是我军根据战场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创造的克敌制胜法宝。

火线上的伟大创造

在毛泽东看来，多打胜仗，或者少打败仗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然而，“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造成主观指挥与客观情况出现偏差，既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因素。比如，战场情况出现了“非所预料的和不可抗的变化”，这就是客观因素。火线诸葛亮会是我军根据战场上遇到的突发情况，处置紧急军情的一个伟大创造。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利用战斗间隙，在战场上召开连排干部会、班战士会，发动大家讨论如何攻克敌人的坚固堡垒阵地，研究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许多新战法。融入了群众智慧的这些战法，对于我军攻克敌阵、打赢战争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我军在火线上创造的这一作战经

验，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军队内部民主运动》中，充分肯定了作战中实行军事民主的做法，就是“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这一创造“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

战场上的显著威力

在解放战争初期的西北战场，西北野战兵团面对十倍于我的敌人，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等战略方针，灵活运用“蘑菇”战术，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取得了西北战场的“三战三捷”。

与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不同的是，1947年5月发起的蟠龙战役是西北战场的第一次攻坚战。蟠龙镇是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重要补给基地，敌人依托蟠龙周围高地设置主阵地，修有很多地堡、碉堡工事，形成交叉火力网。在蟠龙战役之前，我军根据敌人急于寻找主力决战企图，将计就计，派出二纵三五九旅和其他各旅抽调的小部队，配合绥德分区和

黄河边的晋绥军区第三纵队独立旅，造成我军向绥德撤退、东渡黄河的假象，诱使胡宗南部主力北上绥德。但是，敌人在蟠龙镇仍留有精锐6700余人防守。对于解放战争初期缺乏重炮武器和攻坚经验的解放军来说，这无疑是一次硬仗。正如彭德怀在作战会议上所说：“如果说青化砭、羊马河两仗我们是吃了两块肥肉，那么，蟠龙这一仗我们要准备啃骨头，要切实做好攻坚战硬仗的各项准备。”

蟠龙战役打响后，攻击部队发现敌人的力量超出了战前的侦察和判断。“原来以为敌人只有一个旅，谁知一打起来敌兵力不只一个旅，还有两个指挥部”，再加上敌人占据着坚固工事和强大火力的优势，致使我军伤亡大增，未能顺利突破敌人主阵地。

在进攻受阻之际，是撤退还是再战，考验着指战员的意志、胆魄和智慧。彭德怀、习仲勋果断决策，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巩固已得阵地，进行迫近作业。主力在适当地点休息，开连排干部会、班战士会，讨论如何夺取主要阵地”。连队战士分组讨论，纷纷献计献策，找到了对付敌人碉堡和火力网的办法。比如，针对我军攻坚缺少重炮的实际，采取对壕作业逐步贴近碉堡，即“挖S形交通壕，两侧挖猫耳洞，边挖边巩固，逐渐逼近敌前沿”。逼近敌堡后，“靠人工爆破，把

粉状炸药装入干粮袋里捣实”“把炸药袋子挂到碉堡上爆破。战士们称之为‘膏药战术’”。通过这些打法破坏了敌人的工事障碍物，成功瓦解了敌人的防御体系。

机制上的集中研判

火线诸葛亮会，实质上是我军正确地运用军事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灵活处置火线上遇到的非所预料的重大变化，创造的一种敌情实时分析、集中研判的有效机制。在石家庄战役中，这种火线上的敌情分析研判机制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石家庄战役是1947年11月晋察冀野战军和所属部分地方武装发起的攻坚战，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在战役中，“各部队都开了许多诸葛亮会，许多困难都经过群众的力量解决了，攻克要点云盘山，就是个明显的例证，真正做到了边打边学，大家想办法。”

云盘山是石家庄东北角的唯一制高点。山上筑有三层地堡，山脚下挖有内、外两道壕沟，被敌人吹嘘为“铁打的云盘山”。在攻击未果的情况下，我军指战员利用战斗间隙召开诸葛亮会，发扬军事民主，研究新的攻坚打法。比如，为加强对敌火力的压制，研究“把支援火力分成八个组，

重新规定射击目标，调整步炮协同动作”；为了增强直瞄破坏射击的火力，研究了迫击炮平射打碉堡的方法；还决定利用黑夜摸入壕沟内，在两道壕内壁上上部都挖洞埋炸药爆破。等再次攻击云盘山阵地时，这些打法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从攻击开始到占领，仅只十分钟，伤亡十余人，成为攻坚战的范例。

解放战争的实践证明，火线诸葛亮会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邓小平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深刻揭示了人民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原因，特别提及“在火线上开‘诸葛亮会’”等一些小事件，指出“伟大胜利，正是同这些小事分不开的”。而火线诸葛亮会之所以能够孕育，又得益于我军“在部队内部建立了能够充分发扬下级官兵积极性的同志式的关系，并且依靠群众，总结每次战争的经验，从战术到战略都不断地得到进步”。

